

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及族群关系研究

翟国强

滇文化是战国至西汉时期位于云贵高原滇池区域的一支风格独特的考古学文化，以数量众多、特征鲜明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闻名于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朵奇葩。从文化特征来看，既有源自云贵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也有大量来自周边地区如中原、巴蜀、岭南等文化的影响，还有来自更为遥远的欧亚草原、南亚甚至西亚地区的因素，因此滇文化是杂糅了大量其他地区文化因素的一支复合型文化。其中，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使其显得与周边一些典型农业民族的青铜文化差异较大，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

关键词 滇文化 北方地区文化 族群

作者翟国强，1957年生，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邮编100005。

滇文化是战国至西汉时期位于云贵高原滇池区域的一支风格独特的考古学文化，以数量众多、特征鲜明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闻名于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朵奇葩。关于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的关系，过去已有部分学者进行过探讨。总的来看，目前对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关系的研究仍十分简略，多从某些单项特征而不是整体上来研究二者的关系，而滇文化中来自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十分复杂，来源很广，单从某种特征的对比来把握二者的关系不免有些失于偏颇，难以全面了解二者关系的全貌。因此，本文拟对滇文化中的北方地区文化因素进行一次系统梳理，并探讨这些文化因素的传播方式、途径以及与此相关的族群迁徙、流布等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滇文化中的北方地区文化因素

滇文化中的北方地区文化因素涉及很广，从丧葬习俗、服饰到兵器等均有所表现，基本覆盖了滇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见这种传承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一）丧葬习俗

1. 石山墓地

在墓地选择上，石寨山、① 李家山、② 金莲山③等墓地刻意选择在孤山山顶，且山顶多

① 参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参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③ 参见蒋志龙、吴敬《关于云南金莲山墓地的初步认识》，《考古》2011年第1期。

乱石或岩层分布,墓葬就分布在岩石之间或凿穿岩层而成,不少大型墓由于位于岩石之间的缝隙,为规避岩石造成墓边不整齐。这种将墓葬设在石缝之间或岩层之中有可能是石棺葬的一种变通形式。石棺葬在北方地区十分普遍,它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青铜时代达到鼎盛,一直延续至铁器时代。在黄河上游地区的石棺葬主要发现于辛店文化,川西、藏东高原及滇西北、川西南、滇西一带也发现大量的石棺葬,时代要晚于北方地区,其渊源应在北方地区。^①滇文化中这种奇特的葬俗显然与南方农业民族不同,而可能是北方地区盛行的石棺葬的一种变体。

2. 乱骨葬

羊甫头、^②金莲山^③有部分乱骨葬,为乱骨堆放,有的将头砍下来。这种葬式起源于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从齐家文化开始出现,在卡约文化中常见,包括大量扰乱上身或下身骨架的乱骨葬,缺少上肢或下肢的割体葬等,青海化隆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中就有这种葬俗存在。^④滇西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墩子遗址、白羊村遗址墓葬中就有这类葬式发现,滇西北鳌凤山墓地中也有不少二次乱骨葬及割体葬。可见这种葬俗也是从西北地区南传进入本地区的。

3. 祭祀坑

李家山、金莲山在墓上或墓旁有祭祀坑。西北地区祭祀坑遗迹发现颇多,从民和阳山马家窑文化墓地到青海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都有祭祀坑发现。^⑤由此可见滇文化墓上祭祀坑的习俗来自西北地区并渐次向南传播。而祭祀坑中竖立石块的做法也可能与北方地区有关,在墓葬前树立大石的做法在欧亚草原常见,而大石墓前有这种习俗,蜀文化也常有大石记载,不过在滇文化中已简化为在祭祀坑中象征性竖立石块。

(二) 装束、服饰

服饰具有较强的民族识别功能,从滇文化人物图像和塑像的服饰我们能够将各种服饰所代表的人群区分开来,并将这些人群与古代族群的特点联系起来判断其族属。其中有部分服饰特征与北方地区特别是距离西南地区较近的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相近,它们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1. 编发、披发

从发式来看,绝大多数滇人显然属于“椎髻”之民,但也有少数披发和编发的人物,如贮贝器上就有披发和编发的人物形象。而披发、编发是北方民族一种常见的发式。这些披发、编发的人在滇国的地位很低,少数为平民,大多数是作为战俘用以祭祀的牺牲,但从渊源上看是源自西北地区的氏羌族群。

2. 披毡

在滇人装束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大部分男子着披毡,且大多长可拖地。而披毡

^① 参见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头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参见蒋志龙、吴敬《关于云南金莲山墓地的初步认识》,《考古》2011年第1期。

^④ 参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海化隆县半主洼卡约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8期。

^⑤ 参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6页。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等《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是西北地区氏羌族群的一种常见装束，氏羌族群由于以游牧为主并居住在高寒山区，所以披皮服毡的人较多。《隋书·党项传》载“党项羌者……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直到今天部分少数民族如彝族等仍流行以“察尔瓦”（即披毡）作为主要服饰。

3. 动物、人物题材扣饰

滇文化中存在大量各种形制的青铜扣饰，有圆形、长方形以及浮雕等多种，在周边地区少见。但在北方地区有不少单体动物或动物搏斗、人物活动场面的带饰，大部分是用来做腰带上的装饰品，只有少量有实用功能。滇文化的动物纹扣饰从动物格斗、骑马狩猎等题材及艺术风格来看与北方地区的带饰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且均为腰带上的装饰品，没有实用功能，二者的传承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在反映滇文化的出土资料中，铜鼓的鼓面、鼓胸、鼓腰及贮贝器的腹部常装饰精细的几何纹以及动物、人物题材，其中的列兽纹尤为特别。北方地区动物形纹饰是其文化的核心特征，列兽纹在许多器物上都有出现，南俄库班地区克利尔密斯（Kelermes）公元前6世纪斯基泰古墓出土的一件金碗外壁锤碟出成排的鸵鸟、动物搏斗和蹲兽场景。^①中国北方地区也有不少这类题材，川西高原的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中出土的动物牌饰上也有成排的禽鸟、鹿、虎、蛇。^②滇文化铜鼓和贮贝器上的列兽纹是这一主题的继承和发展。

4. 杖及杖头饰

滇文化杖头饰数量众多，是贵族阶层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权杖头起源于近东，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遗址大量出土这种表示权力的标志物，传入中亚草原后，成为辛塔什塔—彼得罗夫斯卡文化的典型器物。^③此后传入中国北方，青海大华中庄出土的鸬首牛犬杖头饰完全具有北方地区的动物装饰风格。^④可以看出权杖头在进入北方地区后逐渐加入了本地常见的艺术风格。西南地区的盐源、滇西北、滇西等地都有各种动物和人物形象的杖头饰。滇文化杖头饰的大量出现无疑是从西亚经中亚传入西北地区后再向南传播的结果。

此外，还有双马纹金饰、石坠及其他服装小饰品等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

（三）兵器

兵器是滇文化中最常见的器物，主要为青铜器，也有少量铜铁合制器和铁器，铁器的出现是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而青铜器和少量铜铁合制器中部分与北方地区文化有渊源关系。

1. 管銎铜啄

滇文化中啄数量众多，形制复杂多样，最早形制为管銎圆锥状刺啄，其原型可以追溯到北方地区的鹤嘴斧，其用途主要为啄击兵器。此外，北方地区文化中管銎斧也极普遍，从商代晚期开始流行，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李家崖文化、围坊三期文化、魏营子文化都有发现。^⑤滇文化中的斧形啄也有相似特点，从形制上看无疑是借鉴了这种管銎斧改制而成的。此后出现的其他形制的啄则是本地文化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因素进一步改造的结果。

① 参见孙机《七轮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参见茂县羌族博物馆等《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③ 参见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参见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等《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⑤ 参见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164页。

2. 平首圆茎一字格铜剑

滇文化中平首圆茎一字格剑数量不少,茎多中空,有的剑茎上有镂孔。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銎柄剑为平首中空圆茎,是该文化主要特征之一,其他地区出现的这类剑数量不多,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向外传播的结果。^① 銎柄剑向西影响到冀北地区和甘宁地区,杨郎文化中环首短剑显然是銎柄剑西传的结果,也为平首圆茎带穿人字格,但剑身中脊已不同剑茎相连。^② 滇文化的平首圆茎一字格剑更接近杨郎文化的环首短剑,但剑格从人字形变为本地流行的一字格,剑茎镂孔也是模仿北方草原文化的做法,在北方草原的铜剑或铜刀上常见镂孔装饰。

3. 曲刃铜剑和铜矛

滇文化中还有数量较多的曲刃剑和曲刃矛,在周边地区均难以见到。而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曲刃剑是其主要特点之一。^③ 这种曲刃剑对外传播主要向东影响到辽宁一带,而向西的影响力较小,只到达冀北地区的玉皇庙文化。曲刃矛在东北地区的吉林、辽宁也发现较多,在吉林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葬中有类似的葫芦形矛,^④ 而长城一带和西北地区少见。滇西北、滇西一带如盐源老龙头、^⑤ 祥云大波那^⑥均有发现,此后传入滇文化中。此外滇西、滇西北还发现有曲刃戈,说明曲刃技术在西南地区使用广泛。虽然中间地域并未发现这类器物,但滇文化中的曲刃剑和曲刃矛应是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向西北再西南长途传播的结果,因为这种相似性也是唯一的。

此外,诸如宽格铜柄铁剑、銎部带凸棱的方銎空首斧、有耳椭圆或六边形銎空首斧等无不带有北方文化的色彩。

以上我们仅从几方面探讨了滇文化与北方地区的文化关系,可以看出北方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涉及到滇文化的大部分领域,对滇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强劲的推动作用。

二、滇文化与北方地区交流的路线和方式

滇文化中大量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出现表明它们之间必有长期密切的文化交流,当然这种交流基本是单向的,即从北方地区源源不断地向南的文化传播,逆向的文化传播很少。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滇文化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中心,也是北方地区南传文化最重要的吸纳地,它同北方地区文化交流的路线和方式与云贵高原其他区域基本一致。

在北方地区和云贵高原之间存在着一重要的民族走廊——藏彝走廊,这是费孝通所提及的三大民族走廊中最早的一条。^⑦ 李星星将费孝通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发挥,对“藏彝走

① 参见郑绍宗《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文物》1984年第2期。

② 参见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181—184页。

③ 参见郑绍宗《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文物》1984年第2期。

④ 参见吉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墓及遗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

⑤ 参见凉山州博物馆等《盐源近年出土的战国西汉文物》,《四川文物》1999年第4期。

⑥ 参见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

⑦ 参见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廊”的走向进行了详细阐释，他认为“藏彝走廊”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中国地势第三级台阶向第二级台阶过渡的地带上，北起甘青交界的西倾山南侧阿尼马卿山至岷山一线，南抵滇西高黎贡山、怒山和云岭南端以及金沙江南侧至乌蒙山西侧一线，其西界沿巴颜喀拉山西侧，南抵横断山系西北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宁静山之北端，其东界由北而南自岷山东侧沿龙门山、邛崃山、大凉山外侧，直抵乌蒙山以西。古藏缅语民族或族群从青藏高原借道“藏彝走廊”东进南下，主要有五条通道，分别是羌语支、彝语支、缅语支等族群由北向南迁徙的路线。^①这条民族走廊是古代民族迁徙最频繁的通道，长期以来北方地区的人民在受到中原地区文化或其他强势文化的压迫后，除向西迁徙至中亚一带外，还有部分人群沿着这条通道南下至云贵高原，使云贵高原汇集了大批北方地区的民族，出现了大量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

实际上，西南地区与北方地区的文化发生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久远得多。西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志性技术和工具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都能看到，它们不是偶然的、零星的，而是成序列（阿修尔工业—莫斯特工业—石叶工业），并以成套工具的形式（如阿修尔工业的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的组合）出现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之中，扮演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角之一，这是早期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应对全球气候波动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而反复进行的横贯大陆的双向迁移、交流与融合的结果。^②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旧石器时代西南与北方地区及欧亚草原之间存在一些零星的关系，但却为后来北方民族大规模南下和文化传播打下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发生了频繁的交流，李昆声认为新石器时代有一条从西北地区向云南和川西南地区文化传播路线：西北原始文化（五六千年前）→西藏昌都卡若文化（四五千年前）→川滇“大墩子—礼州文化”（三千多年前）。^③石硕对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进行了综合分析，提出这一区域内的新石器文化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似性，渊源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是从甘青地区大规模进入藏彝走廊地区后而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一个文化系统。^④此外，他在探讨西藏古代文化时，指出西藏高原的细石器极有可能是华北细石器传统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向南传播进入西藏高原的一支，而西藏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纹饰无论在演变上还是内容上与北方草原都具有一致性，说明这些因素有从东北方向传入的可能性。^⑤

此外，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这一带也出现了大量石棺葬，其内涵多与北方地区文化相似，实际上北方地区文化在进入云贵高原之前先在川西、藏东高原地区积淀了一定时期，文化特征也发生了一些变异，然后再传入云贵高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云贵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年代大多较晚，除少量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上层有零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分布外，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基本阙如，现今绝大部分遗存年代在距今5000年以内，具

① 参见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② 参见黄慰文等《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方元素”与早期人类文化进化》，《人类学学报》第28卷第1期，2009年2月。

③ 参见李昆声《云南原始文化族系试探》，《云南考古线路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参见石硕《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类型及其与甘青地区的联系》，《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

⑤ 参见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9页。

体情况如何目前尚难以断定,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大量西北地区文化因素的出现来看,云贵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繁荣与西北地区的文化影响是分不开的。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最远达到滇东、黔西一带,通海海东、杨山等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彩绘纹饰、高领曲腹小平底罐、小口长颈鼓腹罐等与卡若文化相似,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也有渊源关系。^①黔西鸡公山遗址早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中出土的大量大耳平底罐和小口细颈小平底瓶都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陶器风格一致,其传承关系十分明显。^②不过再往南就很少见北方地区的文化特征,滇东南、黔西南一带已是典型的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滇东、黔西一带则是北方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汇之处,除北方地区文化特征之外,大量的有肩、有段石器和绳纹陶器的出现说明这里也是岭南文化的辐射范围。大量的北方和岭南文化特征在滇东、黔西一带沉淀下来,为后来这一带青铜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青铜时代北方地区对云贵高原的影响更大。从各区域来看,滇西北、川西南一带无疑受北方地区影响最巨,从发现的墓葬来看,墓葬形制、葬式、随葬品都带有明显的西北地区文化特色。而滇西相对较少,这与其与西北地区距离稍远、本地文化相对较强有关,不过滇西青铜文化也是在吸收了大量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它对滇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滇池区域是北方地区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的洼地,大量北方地区文化都在此沉淀,与本地文化及其他方向传播来的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再往南就很少见到北方地区文化因素,而多为滇池区域和滇西区域的文化影响。由此可见,滇文化中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出现是北方地区各区域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后从西北地区经藏彝走廊进入云贵高原后再传入的,这种传播是长时期、多方向、多渠道的传播,最后在滇池区域汇集,成为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滇文化的形成并使之达到较高水平。

从滇文化受北方地区文化影响来看,它所吸收的北方地区文化因素并非与北方地区完全一致,这与二者相距较远、滇文化所受北方地区文化影响已经过中间地域文化层层改造有关。从它所受北方地区文化影响来看,最主要的方式应是从滇池区域和西北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不断吸收而来的,滇文化中北方地区文化因素大部分都在中间地带有发现,如管釜啄、曲刃铜剑和铜矛、山字格铜剑和铜柄铁剑、宽格铜柄铁剑、釜部带凸棱的方釜空首斧、有耳椭圆或六边形釜空首斧、单弯钩铜镞、杖头饰、列兽纹、双马纹、石山墓地、墓内挖棺穴、多人合葬、分层丛葬、乱骨葬、祭祀坑、殉人和殉牲、随葬海贝习俗等在川西、藏东高原及滇西北、滇西、川西南等区域都有发现。当然滇文化对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吸收也带有较强的选择性,如西北地区及中间地带常见的大耳陶罐、带柄铜镜、双圆圈首剑等均未在滇文化中出现。

从滇文化遗存看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以羊甫头、天子庙为代表的滇池北部区域,农具出现的时间早,种类和数量多,特别是收割用的铜镰和后来出现的铁镰十分普遍。从战国中、晚期开始就大量出现尖叶形

^① 参见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等《通海海东贝丘遗址发掘报告》,《云南文物》1999年第2期。陈泰敏:《通海杨山贝丘遗址》,《云南文物》2003年第1期。

^② 参见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8期。

锄、平刃和凹刃铲、爪镰、耙、卷刃器等专业性很强的农具以及形体较大的釜、鼎等炊具，而扣饰的数量和种类较少，只有较为简单的圆形镶嵌玛瑙、绿松石珠的扣饰，雕塑动物形象的扣饰很少，铜鼓和贮贝器的数量也很少，表明居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属于典型的农业民族。此外，铜鼓、铜釜、羊角钮钟、环钮编钟均从滇西一带传播而来，而滇西地区在战国晚期昆明、嵩等氏羌族群的支系进入之前为典型的农业民族文化特征，这些青铜器最早在羊甫头、八塔台等地出现，说明二者之间有较大共同之处，应是相同或相近民族之间的交流。

另一类是以石寨山和李家山为代表的滇池南部及抚仙湖、星云湖区域，青铜器中武器、装饰品和礼乐器极为发达，种类和数量都远远超过其他地方，武器中的啄、剑受北方地区影响很深，扣饰中装饰题材十分发达，表现动物搏斗的题材显然也是来自北方文化的影响。但农具不发达，尖叶形锄和铲出现时间很晚，数量也少，只在部分大、中型墓中有少量发现，而且不少装饰华丽，有的镀锡，说明这些农具并不是实用品而是专门用作随葬的器物，卷刃器在石寨山基本不见，铜镰只有仪仗用的鸟头形长镰而不见实用的爪镰。此外，在青铜器上表现的场景除祭祀外多为战争和狩猎的场面，体现出强烈的尚武精神，这说明石寨山和李家山所代表的人群与农业民族差别较大，而与游牧性强、尚武好斗的北方民族相似，显示其可能有游牧文化背景。

由此可见，滇文化中石寨山、李家山等滇池南部区域的人群与滇池北部区域的人群在葬俗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应该与他们来自不同的族群有关。从滇文化特征来看，它包含有百濮、百越和氏羌三大族群的特征，各种特征相互融合，共同促成了滇文化的繁荣，而滇文化的族属恐怕也不是某个单一族群，而可能是三大族群长期融合重组而出现的复合型族体。

从滇文化分期来看，战国至西汉早期，滇池北部的天子庙、羊甫头大型墓等级最高，占据主导地位；而西汉中期以后滇池南部的石寨山、李家山迅速崛起，大型墓数量多，等级超过滇池北部，成为滇文化的权力中心。这可能与不同族群统治地位的更替有关，石寨山、李家山集团代表的可能是具有更多北方地区文化背景的氏羌族群支系，而天子庙、羊甫头集团则与长江流域的百濮族群关系更密切。由此也可看出滇文化中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大量出现并不仅仅是文化间接传播的结果，也伴有大规模的人群迁移，这些人群与西北地区及中间地带的氏羌族群有较大关系，而滇文化中较为突出的扣饰、动物纹、金器等在西北地区及中间地带缺乏则说明又有一定的差别。

西北地区从青铜时代开始处于长期的衰退之中，而在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装饰品十分发达，以上器类的大量出现说明滇文化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大量出现应该与不同时期不同传播方式有关。其一是长期的文化递次传播，北方地区文化在长期融合过程中，部分因素为西北地区文化吸收，然后逐步向西南地区传播，而在不断向南传播过程中，某些特征被保留，另一些则被放弃，其中有些可能在中间地带沉淀下来，还有一些经过改造后继续南传，到达云贵高原不同区域。当然这种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传播力度是逐步递减的，越往南则越少，变化也越大。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南传步伐是越来越快，后至的文化会将原先沉淀在中间地带的文化一起向南推进，造成云贵高原在短时期内集聚了大量北方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滇池区域则像一个文化洼地，将这些混杂在一起的文化因素吸收过来，经过加工改造成为本区域的文化特色之一。其二，在滇文化的演变过程中，似乎经历过数次跳跃式的发展。从滇文化的分期来看，战国早期以前只有零星青铜器出现，战国早期开始出现有

本地特色的青铜文化，石寨山和李家山出现中型墓葬；战国中期羊甫头出现大型墓，北方地区文化因素进一步增多；战国晚期大型墓增多，在滇池南北的羊甫头、天子庙、石寨山、李家山均有发现，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器类大量出现；西汉中期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型墓数量有较大增加，随葬器物的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了过去，出现大量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① 这种跳跃式的文化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介入有关，其中可能有人群的迁入，而大量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迅猛增加应该与北方地区的族群南迁有关。

根据《诗经》、《竹书纪年》等所记载的气候变化资料，周成王以降，历厉、宣、幽、平时期，将近三百年，至少在黄河流域，经历了一个寒冷转向干旱的气候变化过程。而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从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向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的发展演变十分清晰，文化传承关系明显；而从辛店、寺洼文化向卡约、沙井文化等转变，看不出后者有继承前者的迹象，时代大致在公元前 10 世纪左右。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与气候变化引起的民族迁徙有关。^② 其中一大批人向南迁徙，到达川西、藏东和云贵高原，大量西北地区常见的双耳罐的出现可以说明这种迁徙的浪潮之大，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起源也部分与此相关。春秋以后，秦国开始对西戎进行频繁、长期、大规模的战争，特别是秦穆公时连续向西、向北用兵，“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③ 将西北地区置于秦的势力范围。这次秦霸西戎事件，引起了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运动。而滇西区域青铜文化恰在春秋中晚期开始崛起，铜鼓、山字格剑等在此时突然出现应该与北方地区文化的强力介入有关，是北方地区与本地文化因素结合后形成的。

战国以后，秦国向北、向西陆续兼并、灭亡了狄、绵诸、胸衍、义渠、乌氏、大荔等戎人部落，西面与分布于河湟地区的羌人为邻。“秦献公初立……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得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④ 滇文化的发展大概与这次事件造成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因为从滇西北、川西南及黔西北、滇东北等区域来看，战国中期以后青铜文化的发展要远远快于此前，出现较多北方地区文化因素，可能是北方地区部分族群南下到达滇西北、川西南一带后与本地文化融合形成了区域青铜文化特色。滇西区域青铜文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众多北方地区文化因素，大波那出土的双豹首杖、啄、带柄铜镜等都是北方地区常见器物。而滇文化明显受到滇西文化的强烈影响，战国中期在羊甫头突然出现较为成熟的石寨山型铜鼓以及鼓形釜等都是从滇西青铜文化吸收演化而来的。秦汉之际，匈奴强大起来，冒顿单于“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⑤ 汉文帝时，匈奴又发动了一场西向扩张的战争，不仅“夷灭”了月氏，而且控制了“西域二十六国”。月氏离开河西，开始第二次西迁，“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汉武帝时，“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

① 参见彭长林《云贵高原的青铜时代》，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参见杨铭、柳春鸣《西周时期的气候变化与民族迁徙》，《中原文物》1997 年第 2 期。

③ 《史记》卷 5《秦本纪》。

④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⑤ 《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

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①这一系列的大规模兼并战争造成大量的民族迁徙运动，其中必有部分相对弱小的民族向南迁徙到西南地区避祸，西汉中期以后石寨山和李家山的大型墓的数量和规模及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明显超过了羊甫头和天子庙，显示出政权变更的迹象，而石寨山文化和李家山文化则具有明显游牧民族的特征，说明此时有大批新的游牧民族加入石寨山和李家山集团，使其力量得到加强，从而占据了滇文化联盟政权的主导地位，由此导致大量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集中出现，而且也开始出现不少胡人形象，有的是外来人物装束，有的已成为滇人一员，甚至作为统治阶层出现。

三、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族群关系

北方地区游牧文化分布范围很广，公元前 1000 年以后在中亚地带活动的古代族群有辛梅里安人、斯基泰人、萨尔马泰人、马萨格泰人、塞种人等，新疆及河西一带有吐火罗人的众多支系，西北地区为氏羌，中国北方及蒙古高原一带春秋战国时期分为戎、狄与胡等，战国晚期以后则基本为匈奴。而北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对应关系也有不少相关的探讨，其中乌恩岳斯图对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族属进行的逐一探讨可算是集大成者。^②从文化的对比与文献记载相对应，我们大致可以梳理一下滇文化与哪些北方地区的族群有关。

从滇文化中北方地区文化因素来看，有些是北方各地区共有的特征，如管釜啄、单环首一字格铜剑、釜部带凸棱的方釜空首斧、有耳椭圆或六边形釜空首斧、兵器上的动物塑像、动物及人物题材扣饰、翼虎银带扣、服装小饰品、石坠、动物塑像、列兽纹、编发和披发、披虎豹皮、长衣、长裤、鞋子、石山墓地、随葬海贝、殉人和殉牲习俗等；也有些因素是自东向西传播，如顶部弧形上卷的管釜铜戈、平首圆茎一字格铜剑、人形茎铜剑、曲刃铜剑和铜矛、柄首饰伫立动物的铜剑等；还有些是从西向东传播，如山字格铜剑和铜柄铁剑、单弯钩铜镞、毡帽形头盔和整甲、狮身人面扣饰、尖嘴回首怪兽纹、双马纹金饰、蚀花肉红石髓珠、蜻蜓眼式玻璃珠、杖及杖头饰、陶长颈壶、高尖帽、多人合葬、分层丛葬等；也有一些是直接起源于西北地区如宽格铜柄铁剑、披毡、毛织毡衫、墓内挖棺穴的做法、二人合葬、乱骨葬、祭祀坑等。以上文化因素都是从西北地区经藏彝走廊辗转南下后经滇文化改造后出现的。可以看出滇文化中北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都在此有所表现，这与北方地区文化的迅速传播有关，许倬云曾说“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中叶，几乎处处都有意义重大的族群移动……我相信亚洲内陆，由中北亚东迤今日的西伯利亚及蒙古，以及南迤今日的新疆、西藏，也尝受族群连串大移动的波及，而有其一波接一波的推背行。”^③实际上，北方地区的这种大规模族群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西周时与北方也发生过大规模战争，春秋以后，秦国开始对西戎进行频繁、长期、大规模的战争，直到秦汉时期匈奴对北方地区的征服引起北方

①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

② 参见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 20 页。

③ 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11 页。

地区游牧民族“推背行”式的迁徙运动可能频繁发生。而其中部分族群有可能沿藏彝走廊南下避祸,最后辗转来到滇池区域。因此,从文化因素的角度来看,西北地区的氏羌族群因素在滇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西北地区青铜文化中最具特征的双耳罐在云贵高原北部大量分布,但却未被滇文化所吸收,这是否可以说他们刻意要与使用双耳罐的族群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关,目前尚无确切的答案。

另外,我们从古代文献的零星记载也可找到北方族群南下的蛛丝马迹。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藏缅语诸族是以青藏、云贵两大高原上的土著居民中出自氏羌族系的民族群体为核心,不断吸收诸如百越、百濮、匈奴、月支、鲜卑、汉族等民族群体中的不同部分,经过长期的分化与组合而形成的。^①当然,也有另一种完全对立的看法,认为藏缅语民族是起源于土著的夷系人群。^②不过从考古和民族资料来看,出自西北氏羌族系的可能性要远大于本土起源。先秦两汉时期西南地区藏缅语民族有羌、氏、蜀、叟、巴、賨、僰、昆明、摩沙等。从族源上看,他们都与北方地区的族群有关,而其中部分民族在滇文化分布区域的出现表明他们可能是将北方地区文化因素传播或带入滇文化的人群。此外,彝族、普米族、怒族、景颇族、纳西族的送魂诗都记录了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北方高原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河流往南迁徙而来的,^③说明这种人群迁徙的规模较大,延续时间很长。

滇池区域氏羌族群的分布并无明显的语言方面的证据,但文献对某些氏羌族群支系的介绍还是有一些线索。西南各地氏羌族群支系众多,本区域以僰和昆明为主。

从大量关于僰人的记载来看,僰人最早应分布在西北地区一带,《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引徐广说“僰,羌之别种也。”《汉书·伍被传》也记载“南越宾服,羌僰贡献。”直到东汉末年仍有部分僰人居住在湟水流域一带,《文选》卷 44 陈琳《檄吴将部曲文》说“今者(建安二十一年,公元 216 年——引者注,下同)……与匈奴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霍奋席卷……”与其他氏羌族群支系一样,僰人也顺着藏彝走廊从西北向西南迁徙,沿途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秦汉时期今川西北之岷江流域仍有僰人分布,《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氏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多无君长。”春秋战国时期到达今雅安一带,据《华阳国志》记载“[保子]帝攻青衣(今雅安一带),雄张僚、僰。”^④汉初在今凉山州一带有不少僰人分布,《史记·司马相如传》说“且夫邛笮西僰之与中国并也。”《索隐》说“西夷邛僰。”《史记·正义》云“邛僰山,在雅州荣经县界”。邛、笮都在今四川凉山州境内,说明僰人也在这一带有不少分布。《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通西南夷道,“散币于邛僰以集之”。这些僰人在先秦时期当已存在。秦汉时期在今宜宾地区有大量僰人居住,据《汉书》载,犍为郡僰道县乃“故僰侯国也”。^⑤西汉以后,原居住于僰道县一带的僰人,因当地“汉民多,渐斥徙之”。^⑥又有一部分继续南迁进入滇东北一带,并逐步向滇池区域迁移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爨白蛮”的主要来源。

① 参见万永林《中国古代藏缅语民族源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 页。

② 参见石硕《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研究评述》,《思想战线》2008 年第 2 期。

③ 参见赵心愚《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几个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

④ 《华阳国志》卷 3《蜀志》。

⑤ 《汉书》卷 28 上《地理志》。

⑥ 《华阳国志》卷 3《蜀志》。

《南齐书·州郡志》记载“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① 这些“爨蛮”被称为“爨氏”，说明其族源应是氏羌族群的一支。

以上可以看出爨人起源于西北地区，为氏羌族群的一支，后来逐步南迁至西南地区，在滇池区域也有爨人记载。从滇文化中后期来看，爨人对汉文化的仰慕和模仿程度都很高，大型墓有仿汉式珠襦覆尸的葬俗，滇王墓有仿汉王室的玉衣，而汉式器物在大、中型墓中时有出现，并呈逐渐增多的态势，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从本地式箕坐变为中原式跪坐，最后招致本地文化为汉文化所取代。而在汉王朝与西南夷的交往中，只有滇王对汉使十分友好，“乃留为求道四十余辈”。直到新莽时期，王莽在镇压玉溪一带的爨人起义后将胜休县改为胜爨县，说明该区域爨人数量之众。从以上分析可知滇池区域氏羌族群支系以爨人居多，此后逐渐演变成今日的白族。

氏羌族群的较大支系——昆明在滇池的分布不少，有相当多的记载可以证明。据《史记》记载“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无长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② 《汉书》记载，益州郡 24 个县中，邪龙、叶榆、不韦、云南、嵩唐、比苏集中分布为一组，与益州郡的中心区域滇池区有一定的间隔，设西部校尉管辖。^③ 这一区域即应是嵩和昆明集中分布的区域，后别置永昌郡。

《后汉书》记载“建武十八年（42），夷渠帅栋蚕与姑复（今华坪、盐边）、叶榆（今大理、洱源、剑川）、弄栋（今姚安、南华、楚雄、牟定等）、连然（今安宁）、滇池（今晋宁）、建伶（今昆阳）昆明诸种夷反叛。”^④ 把“昆明”列为反叛诸民族之首，足见它也分布滇中，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东汉荀悦说“昆明子居滇河中。”^⑤ 唐人樊绰《蛮书·山川江源》说“昆池在拓东城西……土蛮亦呼名滇池……滇池水亦呼名东昆池。”^⑥ 此外，《汉书·地理志》有“昆泽县”，不少学者认为“昆泽”指阳宗海或嘉利泽，其县治在宜良或嵩明。^⑦ 虽然这些记载时代都是在东汉以后，但也显示出此前在滇池区域应该已有相当数量的“昆明”人及其他民族分布。从滇文化各种铸像中可见一种与滇人为敌的辫发和披发的民族，他们可能就是“昆明人”形象。^⑧ 另外叶榆、叶榆泽都属于羌语词语，也是由于昆明人在此活动频繁而留下的地名。建初元年（76），哀牢王类牢反叛，率人攻击博南（今永平，“明年春，邪龙县（今巍山）昆明夷卤承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⑨ 东汉以后仍有大量的昆明人生活在滇池地区。汉武帝时为打通通往身毒（印度）的通道，“乃令骞因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犛，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笮，南方闭嵩、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

① 《南齐书》卷 15 《州郡下》。

② 《史记》卷 116 《西南夷列传》。

③ 参见《汉书》卷 28 上《地理志》。

④ 《后汉书》卷 86 《南蛮西南夷列传》。

⑤ 《史记》卷 30 《平准书》“索引”。

⑥ （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25 页。

⑦ 参见宁超《“昆明”考辨》，《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⑧ 参见冯汉骥《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初探》，《考古学报》1961 年第 9 期；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 年第 4 期。

⑨ 《后汉书》卷 86 《南蛮西南夷列传》。

得通。”而在汉王朝设置益州等郡后，“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① 汉王朝将西南夷其他部族征服后派大军进攻昆明人，但历经百年才最后征服他们，这一方面说明昆明人人数众多，是南中人数最多的民族，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强悍的北方民族特性有关。在被汉王朝征服的过程中，昆明人逐步向东散居到滇东、黔西一带，成为后来诸多少数民族的来源之一。至今在广西、云南彝族流传的创世古歌《铜鼓歌》中仍有相当清晰的记载“彝家先辈人，居住在昆仑，巍巍昆仑山，绿草嫩生生，祖辈养牛马，游牧度光阴，古老昆仑山，处处是畜群。”这说明彝族先民的一部分是从昆仑南迁至西南地区的昆明人。^②

滇文化区域还有为数不少的叟人分布。《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晋宁郡“本益州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③ 直到三国、两晋时期仍有不少关于叟人在滇池地区活动的记载。关于叟人来源，一般认为叟与𪛗同声，为同音异字，而斯榆、斯夷、徙等族称，可能是从叶榆转变而来，而这应是古代𪛗、昆明语言的遗留，作为地名其音与“叟”近。张增祺更认为𪛗音通塞，即斯基泰人，滇文化中那些深目高鼻、蓄长须、穿窄长衣裤的人就是𪛗人，他们原来是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塞人，塞人迁入云南后称𪛗人或塞夷，战国至西汉初只分布在“西自同师以东，至牂牁”的较小范围内，后逐渐向越𪛗郡和滇池区域扩张，滇东北昭通一带也有分布，昭通出土的“汉叟邑长”铜印和深目高鼻、蓄长须的人物铜像可能就是当地的叟人。^④ 不过，蒙默认为“叟人”指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也不是部分氐羌系的部落或部族，更不是今天白族的先民，而是指包括青羌、牂牛夷、徙人、青衣羌、西蕃、胡羌、氐、賨等古代民族。^⑤ “氐僂”与“叟”也截然不同，前者分布于今川北及甘南、陕西南一带，后者则主要分布于川向南的今凉山州及云南北部地区。^⑥

看来，关于叟人的面目尚未厘清，他们是否与塞种、斯基泰人有关难以定论，滇文化中深目高鼻、穿长衣长裤的印欧人种特征的人是否就是文献中提及的叟人也无法确知，但他们来源于西北方则没有太多异议。从文献来看，他们可能属于西北地区被氐羌同化的“湟中月氏胡”。《后汉书》记载“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⑦ 他们即《史记》记载的“保南山羌，

①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② 易谋远 《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83页。

③ 《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④ 参见张增祺 《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云南省博物馆三十五周年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增祺 《再论云南青铜时代的“斯基泰文化”影响及其传播者》，云南省博物馆编 《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参见蒙默 《说“叟”》，《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

⑥ 参见陈东、石硕 《魏晋时期的“氐僂”与“叟”辨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⑦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号小月氏”。^① 月氏究竟为何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将月氏与斯基泰人勘同——这种看法适合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的中亚情势。^②

不过，月氏在极盛时曾占据着从蒙古高原西部到西域的广大地区，迄今在内蒙古阴山和鄂尔多斯地区仍有他们留下的具有双马神图案的岩画和其他艺术品。^③ 因为河西走廊似为早期东西方人种在我国境内的地理分界线，^④ 则月氏人可能既有蒙古人种也有印欧人种。滇文化中印欧人种特征的少数人应大多来自西北地区被羌人同化的小月氏人，他们之中有的属印欧人种，而且风俗也与西域各国相同，因此滇文化中从西向东传播的文化因素可能与小月氏人随氏羌族群的南迁有关。他们有些是明显的外来人物，如“纳贡”贮贝器上的长髯老者，也有不少应该已融入了滇人之中，如李家山 M69“播种”场面贮贝器上的着长衣、长裤、鞋者，李家山 M51 三骑士铜鼓上着毡帽形头盔、穿长裤的三骑士，石寨山 M6“战争”场面贮贝器上的持弩者。^⑤

此外，现代彝族也有一些特征与中亚印欧人种有关。法国学者托雷多认为，中国南方有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野蛮人”——“黑罗罗”，他们孤零零地住在群山之巅，身材高大，强壮有力，形象奇特，肌肉发达，肩头很宽。“黑罗罗”外表刚毅，但不粗野，比蒙古人更富表情，脸很生动，呈椭圆形，前额很高，额头肌肉发达，浓密的黑胡子总是卷曲着。从侧面看上去，脸型与蒙古人迥然不同，他们的眼睛很大、鼻子笔直，有的还有鹰勾鼻子，而且他们的颧骨一点也不突出，嘴的大小适度，有的还略嫌太小，嘴唇很厚。腭骨不突出，牙齿长得很漂亮，排列整齐，每颗牙齿都很大。下巴很宽，相当突出，与汉人不同。另一位英国学者布鲁和尔也认为，诺苏（凉山彝人自称）的外貌有些和亚利安人的特点相同，有时可以看到一个诺苏有浅色的头发，甚至还有蓝眼睛的。因此有些人类学者曾猜测诺苏具有高特人（古代东欧的游牧民族）祖先的成分，他们认为诺苏最早的祖先是来自外高加索一带经库库滇尔而来。^⑥ 这也说明北方地区印欧人种的南迁规模应该不小。

四、结 语

滇文化与北方地区的文化关系基本上是北方地区文化对滇文化单方面的影响，是一个长时期、长距离和波浪式的传播过程，同时滇文化对北方地区文化的吸纳也是多渠道的，因此北方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可能在滇文化中同时出现，使我们难以准确把握滇

①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② 参见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28页。

③ 参见王大方《学术界关于月氏在内蒙古等地区的历史及文物遗存综述》，《内蒙古考古》2001年第2期。

④ 参见潘其凤《关于中国古代人种和族属的考古学研究》，《燕京学报》（新九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 参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⑥ 参见张良春等编译《西方著作中关于彝族的论述》，《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

文化中各种与北方地区有关的文化因素的发展脉络，只能知其大概。北方地区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是通过连接西北与西南的藏彝走廊实现的，大部分是通过文化的间接传播，也有伴随人群迁徙的直接输入。滇文化主要与西北地区的氏羌族群关系密切，大量氏羌族群或与其相关的民族大规模南下，并在西南山地广泛分布，僂、昆明、叟等民族在滇文化分布区出现，其中的少量印欧人种可能与湟中月氏胡有关。

以上关于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及族群关系的研究仍只是一个初步结论，要廓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还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方法，如体质人类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加入会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金莲山墓地出土的大批人骨可能是一个契机，对其综合分析将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 书 讯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博士著《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一书，已于 2009 年 11 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 23 万字，共分六章，主要对清代著名的边疆史地学著作《皇朝藩部要略》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一章利用稀见史料，对《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祁韵士及张穆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二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成书背景以及版本进行了研究；第三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诸多史实进行了考证；第四章考证“藩部”概念的提出及其形成过程；第五章对清代的“藩部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第六章对《皇朝藩部要略》进行了全面评价。

综观全书，既有对《皇朝藩部要略》一书的文本研究，又有对清代“藩部”概念及体系的系统阐述，观点新颖，对清代边疆史尤其是藩部研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ok active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copper production greatly to meet the military need and support Chinese to resist Japan. Meanwhile ,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of copper mining industry in Yunnan province had been promo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 which also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mining modernization of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Yunnan the copper mining industry the Anti – Japanese War the resources for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n the Relations of Yunnan Culture and the Northern Area Culture and the Ethnic Groups Zhai Guoqiang (73)

Yunnan culture , which was famous for its numerous and distinctive bronze , gold and jade wares , was a kind of uniqu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which was located in the area of Dianchi Lake (滇池) in the Yunnan – Guizhou Plateau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Yunnan culture stemmed from the Neolithic culture and impacted by the cultures of its surrounding areas such as the central plains , Bashu and Lingnan , and remote areas such as the Eurasia Steppe , the South Asia and the West Asia. Thus Yunnan culture was compound , and the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area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 which made Yunnan culture localized and different from the bronze culture of surrounding ethnic groups characterized with typical agriculture.

Key words: Yunnan culture the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area ethnic group

The Tajin Tribe (塔金) of Lhoba People (珞巴族) and its Social Vicissitude in the Disputed Area of Sino – Indian Territories Li Jinke Ma Dewen (87)

Lhoba people is an ancient ethnic group who lived in the southern Tibet of China. Only thousands of Lhoba people live in the areas under China's actual control , while hundreds of thousands live in the disputed area of Sino – Indian territories. Tajin tribe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south Tibetan Lhoba people , and the people inhabit the area of the Xibaxiaqu (西巴霞曲) which is along Shannan (山南) and Linzhi (林芝) border. Since the 1950s , most of the Tajin people are under the control of Indian. Due to the lack of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the inconvenience of investigation , domestic scholars paid less attention to them. Based o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 materials ,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shallow discuss with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social vicissitude of the Tajin tribe of Lhoba people in the disputed eastern area of Sino – Indian territories.

Key words: the disputed eastern area of Sino – Indian territories Lhoba People Tajin Tribe social vicissit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golian Yurt and the Ancient Qionglu (穹庐) Yu Xuebin (103)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ancient Qionglu in the records has a variety of styles , and yurt is only one of them.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 the Mongolian yurt is a kind of Qionglu , however , not all Qionglu are yurt. The Baizi tent (百子帐)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should be the earliest yurt in history and the Mongolian yurt finalized the desig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